

从弃儒入佛到弃佛归儒

——屈大均的独特遗民人生

钟新果

(南华大学 语言文学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 明遗民屈大均在明清之际的动荡社会中,弃儒入佛,后又弃佛归儒,并成为遗民中辟佛的代表人物之一,演绎了一道乱世文人的独特人生轨迹;因父亲生前不仕异族的教导和满族薙发令的逼迫而弃儒出家;后又因事亲 and 认为儒优佛劣而弃佛归儒,并提出和采取了正本清源、以儒易禅及抨击“忠义佛门”等辟佛主张和措施;有意思的是屈大均生前已弃佛归儒,死后人们却不许其归儒,构成了特定时期一种奇特的遗民命运,从中可以管窥明遗民命运的坎坷与悲辛。

[关键词] 屈大均; 儒; 佛教; 遗民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21)04-0110-04

DOI:10.13967/j.cnki.nhxb.2021.0064

屈大均(1630—1696),原名绍隆,字翁山,又字介子,广东番禺县(今广州市番禺区)人,明末诸生,“岭南三大家”之一。顺治三年(1646),清军攻陷广州,其师“岭南三忠”之一的陈邦彦也因起义师抗清,兵败殉节而死,加上其父亦以不仕异族戒之,于是,屈大均放弃诸生资格而隐居。顺治五年(1648),李成栋在广州反清归明,屈大均赴肇庆南明永历帝处,上《中兴六大典书》,大学士王化澄又上疏举荐他,但就在永历帝将授官重用之时,因闻父病而归。顺治七年(1650),屈父死,接着广州再次被清兵攻陷,于是出家为僧;在度过12年的僧侣生涯后,又弃佛归儒,蓄发奉母隐居;吴三桂叛清时,又曾积极参与,后观其难以成事,遂隐居以终;死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终年六十七岁。屈大均在明清之际的动荡社会中,弃儒入佛,后又弃佛归儒,并成为明遗民中辟佛的代表人物之一,演绎了一道乱世文人的独特人生轨迹。下面就屈大均的独特遗民人生展开具体探讨。

一 弃儒入佛

顺治七年(1650)冬,21岁的屈大均在番禺圆冈乡雷锋海云寺,拜函丕天然和尚为师出家,法名今种,字一灵,又字骚余,开始了他的僧侣生涯,成为一名遗民僧。屈大均在《死庵铭》中记此事云:“予自庚寅丧乱,即逃于禅,而以所居为死庵。”^{[1]191}

(一) 出家原因

屈大均的出家入佛应出于“不得已”。屈大均

自己也在《归儒说》中说:

…固尝谓人曰,予昔之于二氏(佛、道)也,盖有故而逃焉,予不得已也^{[1]124}。

那么,屈大均究竟为什么“不得已”而出家呢?原因应主要有两个:

1. 父亲生前的教导和强烈的爱国情绪

(1646)广州陷,(屈大均)父以不仕异族之义戒之。陈邦彦、陈子壮、张家玉起兵谋攻广州,兵败皆死节,大均实预其事。大均尝从邦彦学,师仇国恨,积愤益深。乃弃诸生辈而隐焉。迨李成栋反正,明势复张,赴肇庆行在上《中兴策》。……以父疾遄归。父没后,清兵大起,桂粤相继陷没,大均以事无可为,削发为僧(法名今种)^{[2]319}。

顺治七年(1650),屈大均的父亲去世,生前曾告诫他不得出仕异族。在宋明理学的熏陶下,当时文人们往往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当清兵入关,攻占北京,明亡已成定局之时,许多有气节的文人士大夫宁死不屈,不少文人仍对南明王朝寄予了极大的希望。屈大均作为“岭南三忠”之一陈邦彦的弟子,更是为力图恢复汉家天下而奔波,为此不放弃任何一丝希望。后知事已不可为,才不得已退隐尘世之外。

2. 满清薙发令的逼迫

清廷在顺治二年(1645)颁发了薙发令,自此在清朝统治区,除僧、道外的所有人均须依清制剃发,

无论是出仕为官、做百姓,还是做山林隐士,均须剃发。剃发与否,成为是否臣服于新朝的标志。有些遗民为了坚守气节,保持故国衣冠发式,逃于深山穷谷之中或关在土室之中闭门不出,但也往往被告发而难于幸免:

自髡发令下,士之不忍受辱者,之死而不悔。乃有谢绝世事,托迹深山穷谷者,又有活埋土室,不使闻于比屋者。然往往为人告变,终不能免^[3]。

在屈大均父亲去世的当年十一月初三,广州再次被清军攻陷,并惨遭屠城。广州沦陷后,随着清军重新占领广东,不依清制剃发就会有生命危险,而剃发则表示向清廷臣服,又是违背父命和自己的意愿,是屈大均无法接受的。

因此,屈大均只好“不得已”出家为僧。因为佛门在当时可以衣冠不改,剃发也不依清制,而佛门历来就有“沙门不礼王者”(释慧远语)的传统,可以借此表达对清廷的不合作态度。他出家为僧的目的:一是为了逃世避祸;二是留待日后伺机再起。后一点对屈大均来说,应更为重要。当时清王朝统治天下大局已定,但他并非一心退隐空门,仍是心存匡复之志,即所谓“(大均)忠爱根于天性,其为浮屠也,本有托而逃,终有故国旧君之感”^{[2]320}。另外,《胜朝粤东遗民录》卷一记载屈大均出家事云:

己丑父歿,大均削发为僧,事函巽于雷锋,名今种,字一灵,又字骚余,名所居曰“死庵”,复取永历钱一枚,以黄丝系之,贮以黄锦囊,佩肘腋间,以示不忘^{[4]392}。

屈大均在出家后竟用一枚永历钱币贴肉收藏佩戴,“以示不忘”,可见其对明王朝的刻骨铭心和出家实出于不得已之情。

另外,晚明以来的禅悦风气也不可否认地对屈大均有所影响,屈氏在出家之前,已与其师函巽和尚有五年的交谊,其出家也应是“渐而非顿”。

(二) 匡庐之行

顺治九年(1652),在为僧后的第三个年头,屈大均开始了他以僧人身份的首次出游——匡庐之行。其《髻人说》云:

壬辰年二十三,为飘然远游之举,以城市中不可以幅巾出入,于是自首至足,遂无一而不僧^{[1]471}。

壬辰年也就是顺治九年(1652),由于此次江西庐山之行,必须经过清朝统治区的城市,屈大均的装束已是十足的僧侣装扮了。在由粤入赣赴庐山途中,经过赣州时,写有《赣州》诗二首,其二云:

义士魂何去,沙场一放招。黄衣归朔漠,碧血满南朝。山枕孤城峻,江通百粤遥。天生形胜地,空助虎狼骄。

吟咏江西抗清义师之败,语气极其沉痛。《过彭蠡》诗有“平陈功烈在,遗恨与神京”诗句,也影射时事。他此次庐山之行,从离粤至庐山再到返回所居的罗浮山为止的两年多时间里,共有38首诗流传至今。但这38首诗中,与佛教相关者仅少数几篇,如《开先寺古梅》《开先寺楼作》《归宗寺》与《登石门怀慧远尊者》,多以写景为主,无任何禅理;其他诗作也多是写景抒怀。从这些诗作看,屈大均在庐山活动多是居佛寺,游山景,吟咏湖光山色,而与佛事相关无几,展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地道的遗民伪僧形象。

(三) 金陵、京师、关外、吴越之游

在从庐山返回罗浮山一年之后,即顺治十三年(1656), (师祖)道独(空隐)和尚住持广州海幢寺,选屈大均作为侍者。也就在这年,屈大均为道独和尚的《叶严宝镜》作跋。此跋文也是现在能够见的屈大均生平唯一的一篇佛学著述。

顺治十四年(1657),屈大均受道独委派北上沈阳探望(师叔)函可禅师,开始了他长达五年的金陵、京师、关外及吴越之游。

屈大均于这年秋天出发,第二年(1658)春天至北京,哭拜崇祯皇帝死社稷处。关外之行后,便一直在京师及吴越之地周游。他在游历金陵时,不由发出了“如何亡国恨,尽在大江东”(《秣陵》)的沉痛感慨;在参访南京灵谷寺时,也发出了“兴亡无限恨,消得一声钟”(《灵谷寺》)的感叹;并和当地的遗民一起纪念崇祯,凭吊孝陵。屈大均到明太祖的孝陵进行瞻拜时,正好碰上驻防的清兵砍伐陵殿木柱,他赶紧出钱阻止,并请求他们不要破坏孝陵林木。另外,屈大均还与京师及吴越等地的明遗民集会,祭拜南宋遗民谢翱墓,与魏畊谋议迎接郑成功舟师,和王士禛、朱彝尊、钱谦益、祁班孙、汪婉、毛奇龄等交游唱和,并撰写《皇明四朝成仁录》。屈大均的这些作为,都显示他是一个仍心系前明故国的遗民僧。

另外,《胜朝粤东遗民录》卷一记载屈大均在此次游历中,“其至诸寺刹,则据上座,为徒众说法,时年不过三十也。”^{[4]392}这说明屈大均游历期间,在各地寺庙参加了不少佛事活动,他能上座说法,则说明其对佛教教义也应有较深的理解和领悟,不然他也不会同时得到函巽和道独二位禅门高僧的器重。但现在很少有关于屈大均佛教方面著述及事迹流传,可能是由于他后来弃佛归儒后,有意为之的结果。

康熙元年(1662),屈大均结束了此次长达五年的北上之游,返回广东,并在这一年结束他的禅僧生涯。

二 弃佛归儒

康熙元年(1662),屈大均结束北游回粤省母。也就是在这年,屈大均33岁结束了他的僧侣生涯,开始

蓄发返儒。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卷十五记载此事云:“是时虽弃沙门服,犹称屈道人,不欲以高僧终,而以高士始。”由于不愿再过僧侣生活,不甘以高僧终老,放弃了沙门服饰而开始归儒,过他高隐之士的生活。那么,屈大均在度过十多年的禅僧生涯后,为什么会选择弃佛归儒呢?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

(一)为了事亲

屈大均在《髻人说》中讲到返儒之事说:

既已来归子舍,又不可以僧而事亲,于是得留发一握为小髻子,戴一偃月玉冠,人辄以罗浮道士称之^{[4]393}。

康熙元年(1662),屈大均已33岁,返粤省母,见到年迈的母亲后,决心在母亲身边尽孝,但由于不方便以僧人身份事亲尽孝,于是便弃佛蓄发而返儒。屈大均也确实是一位至孝之子,永历初年就是因为父亲生病而放弃在永历小朝廷做官的机会;他对母亲更是至孝,《胜朝粤东遗民录》卷一记载:

(屈大均)性至孝,每出游,念母则归省,母病,割股以疗。母年九十歿,庐于墓侧,踰三年^{[4]393}。

母亲病了,居然割自己大腿上的肉作为治疗之药,办法虽未必有效和科学,但其至孝之心,却是昭然可见。屈大均在《陈文恭集序》中云:

朱子不言静而言敬,盖患人流入于禅,然惟敬而后能静。敬也者,主静之要也。盖吾儒言静,与禅学辞同而意异:吾儒以无欲而静,故为诚为敬;禅以无事而敬,故沦于寂灭而弃伦常,不可以不察也^{[1]48}。

对于屈大均这种至孝之人来说,佛教“沦于寂灭而弃伦常”的教义与行为应是他最无法忍受的吧。可以说,事亲是屈大均弃佛返儒的直接原因。

(二)认为儒优佛劣

屈大均经过多年的逃禅生活,通过自己的亲身体会,对儒佛进行比较,最终认为佛不如儒。如他在《归儒说》中云:

予二十有二而学禅,既又学玄。年三十而始知其非,乃尽弃之,复从事于吾儒。盖以吾儒能兼二氏,而二氏不能兼吾儒,有二氏不可以无吾儒,而有吾儒则可以无二氏云尔^{[1]124}。

经过十多年的弃儒而学禅、学玄的经历后,屈大均更加坚定地认为儒优于佛、道,从而将儒家视为正统,视佛道二家为旁门左道,终于又回归于儒。他在此文中进一步说:

(有人)以为新会、余姚之言,犹似夫禅之言也。吾窃以为不然。夫新会、余姚,孔门之冢子冢孙也。新会曰致虚,余姚曰致知,夫非《大学》明德,《中庸》明善之旨耶?世之哓哓者,以为似禅,岂惟不知儒,抑且不知禅之为禅矣。嗟夫,今天下不惟无儒也,亦

且无禅。禅至今日,亦且如吾儒之不能纯一矣。故夫以儒为禅,禅者学之,失其所以为禅;以禅为儒,儒者学之,失其所以为儒,皆不可也。知其不可而弃之,能知儒之精,斯知禅之精矣。禅之精,尽在于儒,欲知禅之精,求之于儒而可得矣^{[1]124}。

首先,屈大均对有人认为新会(陈献章)、余姚(王阳明)之言似禅的说法进行批判,严格儒禅区分;其次,认为儒禅不能互相“阑入”。如果“阑入”,就会造成“以儒为禅,禅者学之,失其所以为禅;以禅为儒,儒者学之,失其所以为儒”的后果;最后,自信地认为儒家学说是最精微的,甚至禅者也无须学禅,只要学儒,就可以“知禅之精”了。

可以说,认为儒优佛劣,应是屈大均弃儒返佛的根本原因。

因此,屈大均归儒之后,在所著的《归儒说》中表现出一种洗脱“昨日之非”的快意:

今以二氏以吾为叛,群而攻之,吾之幸也,使吾儒以吾为叛,群而招之,斯吾之不幸也。又使天下二氏之人皆如吾之叛之,而二氏之门无人焉,吾之幸也;使天下儒者之人皆知吾之始逃而终归之,而吾儒之门有人焉,则又吾之幸也^{[1]124}。

他还进一步自豪地宣布:

然昔者,吾之逃也,行儒之行,而言二氏之言;今之归也,行儒之行,而言儒者之言^{[1]124}。

终于由儒行僧言的遗民伪僧,回归为儒行儒言、表里如一的儒家遗民了。

屈大均归儒后就由逃禅之遗民变为了辟佛之遗民,并且还提出和采取了一些自己的辟佛主张和措施:

第一,正本清源。屈大均认为应将儒家中所“阑入”的佛教言论,悉皆删除,以达到正本清源的目的。如他的《广东文选自序·凡例》第一条云:

是选以崇正学,辟异端为要。凡佛老家言,于吾儒似是而非者,在所必黜。即白沙、甘泉、复所集中,其假借禅言,若悟证顿渐之类,有伤典雅,亦皆删削勿存。务使百家辞旨,皆祖述一圣之言,纯粹中正,以为斯文之菽粟,绝学之梯航^{[1]43}。

屈大均在此自言他所编《广东文选》的目的是“崇正学,辟异端”,而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就是将“凡佛老家言,于吾儒似是而非者,在所必黜”,如(陈)白沙、(湛)甘泉、复所等儒者集中“假借禅言,若悟证顿渐之类”,尽皆删除,以达到使“百家之言,皆祖述一圣之言”,成为“绝学之梯航”的效果。可以说,此条凡例是他“正本清源”辟佛主张的最好体现。

第二,以儒易禅。为了反击佛门中人以禅易儒,而提出要以儒易禅的主张。他在《归儒说》中云:“禅之精,尽在于儒,欲知禅之精,求之于儒而可得

矣。”^{[1]7}认为儒优于佛,学儒即可以知禅之精,是屈大均提出以儒易禅的思想依据。他还提出以儒易禅的具体措施,如《过易庵赠庞祖如序》云:

嗟夫,今天下之禅者,皆思以其禅而易吾儒矣。顾吾儒独无一人,思以儒而易其禅。……今使有一醇儒于此,能以斯道讲明庵中,使儒者不至流而为禅,而禅者亦将渐化而为儒,予以维持世道,救正人心,昌明先圣之绝学,其功将为不小^{[1]87}。

庞祖如是居于易庵的僧侣,屈大均在赠给他序文中,居然不客气地建议庞氏应该在易庵请一“醇儒”来宣讲儒家之道,以使“禅者亦将渐化而为儒”。

第三,抨击“忠义佛门”。屈大均认为“忠义佛门”的出现恰是儒家文人士子的不幸:

嗟夫!圣人不作,大道失而求诸禅;忠臣孝子无多,大义失而求诸僧;《春秋》已亡,褒贬失而求诸《诗》。以禅为道,道之不幸也;以僧为忠臣孝子,士大夫之不幸也^{[1]318}。

屈大均在归儒后,对他曾经的师父著名的“忠义和尚”函罡天然禅师,亦不放过,出言抨击。孙静庵《明遗民录》卷四七“天然禅师函罡”条云:

屈翁山始称今种,想亦曾师天然者。乃其《新语》中引《叶石洞外志》,等仙释于瑶僮,谓其灭弃人伦,诡言出家^{[4]1293}。

以至孙静庵都为天然和尚抱不平:

则是桑海之际,一老比丘力驱此辈入道,未尝不大补于风教也。翁山顾愿毁之,独何哉?^{[4]1293}

如此对待昔日的师父,以至不近人情,但也可见其辟佛之彻底。

三 归儒不得

大概令屈大均想不到的是,尽管他在生前已弃

佛归儒,并著《归儒说》为自己辩护,但他死后,人们仍将他归为僧侣,不许其“归儒”。如沈德潜在乾隆三年(1738)辑《明诗别裁》时,选入屈大均诗六首,但将其编“方外”部分,并题作者为“今种,字一灵,番禺人”,梁善长在乾隆十二年(1747)选刻的《广东诗粹》十二卷中,选屈诗三十五首,也编入“方外”部分,作者也题为“今种”,即使到了屈大均已死一百多年的嘉庆年间,温汝能《粤东诗海》、王昶《明词综》等选屈大均诗文时,仍题作者为一灵。

赵园女士在《明清士大夫研究》中认为这令人啼笑皆非。其实,这也不完全是后人不知屈大均后来已弃佛归儒,而是鉴于清朝令人闻虎色变的“文字狱”,后人既想保存流传其诗文,又不想触患文字之忌而想出一个折中办法。果不其然,屈大均因其诗文集多有记清初暴政和纪慷慨殉国节烈士的“悖逆语”,而被销毁其书,他两个不识字的孙子也因私自收藏其书而被斩首。

屈大均生前弃儒入佛,最终又弃佛归儒,并成为遗民中辟佛的代表人物之一,但死后人们却不许其归儒,从而构成特定时期一种奇特的遗民命运。我们也可从中管窥明遗民命运的坎坷与悲辛。

[参考文献]

- [1] 屈大均. 屈大均全集:第3册[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 [2] 祝秀枝. 粤海旧闻录[M]. 台北:圣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7.
- [3] 黄宗羲:两异人传[M]//黄宗羲全集:第11册.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53.
- [4] 谢正光. 明遗民录汇辑[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

From “Discard Confucianism to Buddhism” to “Discard Buddhism to Confucianism”

——Qu Dajun's unique life of the diehard

ZHONG Xin-guo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Qu Dajun was the diehard of Ming Dynasty, who was living in the turbulent society between the Ming Dynasty and Qing Dynasty. He discarded Confucianism to Buddhism, and then discarded Buddhism to Confucianism. He became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diehards who resist Buddhism, interpreted a unique literati's life in troubled times. At first he was forced to be a monk because his father instructed him not to work for Qing government and Manzu's cutting hairs order. Later, he discarded Buddhism to Confucianism because he had to look after his mother and regarded Confucianism superior to Buddhism. He criticized “loyalty Buddhism”, further proposed and adopted some radical reform to resist Buddhism. Interestingly, before his death, Qu Dajun discarded Buddhism to Confucianism, while people didn't allow him into Confucianism after his death, which constituted a strange diehard's life at particular period. In it, we can find the bumpy and miserable fate of the diehards.

Key words: Qu Dajun; confucianism; buddhism; diehards

(本文编辑:魏月华)